

《杨万里传》补订

周 启 成

杨万里，字廷秀，号诚斋，南宋著名诗人和思想家。多年来，研究杨万里者，多把《宋史·杨万里传》（以下简称《杨传》）作为主要传记材料来参考。然而，笔者近来发现《杨传》有些失误，有订正之必要。为有助于杨万里研究的深入，兹列举于下：

（一）“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，为赣州司户，调永州零陵丞。”

按：杨万里在任赣州司户与零陵丞之间，曾任全州丞，《宋史》失载。杨万里《书吕圣与零陵事序》：“侯（指吕行中）尝为零陵宰。予尝为丞全州，兵执其守臣以叛，全距永不百里，永之摄守惧，告潭师（帅？），请讨之，持书者前矣，侯夜叩州门谒守曰：讨之是济其乱，且震湖南，独全州乎？”（《诚斋集》卷七八。四部丛刊影宋本）。又绍兴三十二年杨万里《得亲老家问二首》云：“济世吾无策，迎亲仕屡惊。”下有附注：“时全州兵执王守方抚定。”（《诚斋集》卷一）可见全州发生兵乱事件时，杨万里正任全州丞。杨任职全州当在绍兴二十八年（戊寅）至绍兴二十九年（己卯）秋之间。因为杨万里《达斋先生文集序》云：“后四年（从绍兴甲戌算起）某自赣掾辞满，乃归南溪。”（《诚斋集》卷七九）则赣州司户任满在绍兴二十八年。而杨万里《顺宁文集序》云：“余绍兴己卯之冬负丞永之零

陵。”（《诚斋集》卷八一）可见绍兴二十九年时，杨已任零陵丞。

（二）“浚入相，荐之朝。除临安府教授，未赴，丁父忧。”

按：张浚举荐杨万里时，尚未为相，故杨万里《谢张丞相荐举启》云：“上既起公，将属之大事，公初荐士，宜简于异能，何误及于羸单？”（《诚斋集》卷四九）则时当在绍兴三十二年，孝宗手书召见张浚之初。而杨万里除临安府教授则在张浚再相时（隆兴元年十二月），故杨万里《除临安府教授谢张丞相启》中云：

“不拟此来，适遭大拜。”（《诚斋集》卷四九）当时杨万里已赴京师，还曾被引见孝宗一次，隆兴二年（甲申）正月十五日前方因父病回乡（见《诚斋集》卷二《引见前一夕寓宿徐元达小楼，元达招符君俞、胡季永小集，走笔和君俞韵》、《甲申上元前闻家君不快，西归见梅有感二首》）

（三）“改知隆兴府奉新县，戢追胥不入乡，民逋赋者揭其名市中，民灌趋之，赋不扰而足，县以大治。会陈俊卿、虞允文为相，交荐之，召为国子博士。”

按：从传文看，杨万里知奉新县之命与陈、虞二相无关，其实并非如此。乾道三年杨万里赴京上《千虑策》，由陈俊卿推荐给虞允文，虞对杨留下很深印象（见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十《雍公荐士》；《诚斋集》卷六三《与左相陈应求书》）。乾道五年虞允文回京后即举荐杨万里，故杨万里《知奉新县到任谢虞右相启》中有“顷缘下客之末，堕在荐书之中”之语。按宋制，由选人入为京、朝官必须先任知县（见《燕翼诒谋录》卷三《京朝官须入知县》），要将杨万里调入京城供职，先任他为知县，是必不可少的过渡，这就是杨万里先在奉新任知县，而只做了六个月就被调往临安的原因。

乾道六年十月六日杨万里被任为国子博士（见《诚斋集》卷一三三，《国子博士告词》），其时，陈俊卿已经罢相，所以

《杨传》说：“会陈俊卿、虞允文为相，交荐之”，是不对的，杨万里后来谈到此事，也只归功于虞允文（见《诚斋集》卷六七《虞祖禹兄弟书》）。

（四）“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。盗沈师犯南粤，帅师往平之。孝宗称之曰：‘仁者之勇’，遂有大用意，就除提点刑狱。请于潮、惠二州筑外砦，潮以镇贼之巢，惠以扼贼之路。俄以忧去。”

按：杨万里淳熙六年正月被任为提举广东常平茶盐，淳熙八年二月即被改任为广东提刑（俱见《诚斋集》卷一三三之告词）。淳熙八年曾作《闰三月二日发船广州来归亭下，之官宪台》之诗（《诚斋集》卷十六）。他率军镇压沈师在当年冬初，“闽盗入吾部，梅川作潢池。……士皆冲冠怒，人挟报国私。我行梅始花，我归柳应丝。”（见《诚斋集》卷一七《古路》）乃是先就提刑之职，后方率军平“盗”。而向朝廷建议于潮、惠二州筑外砦也不在当时，而是淳熙十一年（甲辰）免丧召回京师后在所上札子中提出的（见《诚斋集》卷六九《甲辰以尚左郎官召还上殿第一札子》）。

（五）“（因争张浚配飧高宗，得罪孝宗）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。”

按：杨万里出知筠州时并不带直秘阁之贴职。淳熙十五年孝宗因杨万里与洪迈争论配飧之事，曾批示：“洪迈、杨万里并求补外，可与郡而无职名”（见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一七三《思陵录下》四库全书本），可见夺去贴职在当时是一种处分。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，方命恢复杨万里直秘阁贴职。《再复直秘阁告词》云：“敕朝奉大夫（按：似当作朝散大夫）知筠州军州事杨万里：朕登践宝位，缅怀儒英，因其寄职之未还，遂阅有司之列上，复其旧物，以示庆恩。”（《诚斋集》卷一三三），时为该年五月四日。

(六) “绍熙元年，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，兼实录院检讨官。”

按：金使既为贺正旦使，当在绍熙元年元旦前抵宋。淳熙十六年冬杨万里即已接受接伴使使命，有《衔命效劳使客船过崇德县》诗（《诚斋集》卷二七）。

(七) “（绍熙元年）会进《孝宗圣政》，万里当奉进，孝宗犹不悦，遂出为江东转运副使，权总领淮西、江东军马钱粮。”

按：进《孝宗圣政》并不在绍熙元年，而是在绍熙三年十二月（见《宋史》卷三六《光宗纪》），其时杨万里已从江东副使卸职回乡去了，所以此段记载失实。

(八) “（杨万里任江东转运副使时）朝议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，万里疏其不便，不奉诏，忤宰相意，改知赣州，不赴。”

按：当时朝廷并不是要在江南行铁钱，而是要在江南行铁钱会子。铁钱会子是一种以铁钱作币值本位的地方性纸币。杨万里有《乞罢江南州军铁钱会子奏议》说得很清楚：“今新会子之法曰：每贯并准铁钱七百七十足行使”。“江南禁铁钱，而行新会子。不知军民持此会子而兑于市，欲兑铜钱乎，则非行在之会子，人必不与也；欲兑铁钱乎，则无一铁钱之可兑也。有会子而无钱可兑，是无母之子也。”（《诚斋集》卷七十）

(九) “开禧元年，召，复辞。明年，升宝谟阁学士。卒，年八十三，赠光禄大夫。”

按：据《杨传》所记杨万里享年，则当生于宣和六年（公元1124年），然而此说是错误的。杨万里长子杨长孺在《诚斋杨公墓志》（《诚斋文集》卷末）中明确地说“先君于建炎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。”建炎元年为公元1127年。又周必大题

《三老图》小序云：“郡士刘讷以乘成兄生于乙巳，而予丙午，诚斋丁未，写《三老图》，为题四韵。”（见《诚斋集》卷四一）。又杨万里《浩斋记》云：“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。”

（《诚斋集》卷七三）此记末署：“淳熙己酉（公元1189年）闰月十二日”，推算起来也当生于建炎元年（丁未，公元1127年）又杨卒于开禧二年（公元1206年）（见《诚斋集》卷一三三《谥文节公告议》），则享年应为八十。

（十）“万里为人刚而褊。孝宗始爱其才，以问周必大，必大无善语，由此不见用。”

按：杨万里与周必大为同乡，少年时即交厚。周必大进身较杨万里早，仕途上对杨万里也是常予照应的。淳熙二年，周必大曾向孝宗举杨万里自代（见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一二二《举杨万里自代状》）。淳熙十四年，周必大任右相，一次孝宗、周必大、王淮等商量政事，周必大记载说：“予因奏秘书省亦是要讨论典礼，见阙长贰，欲一并除人，上曰：‘好，欲用谁？’予与王相同言：‘杨万里，其才也。’上曰：‘可’。”（见周必大《文忠集》卷一七二《思陵录上》）于是杨万里被任为秘书少监。此次的任命可说完全出于周必大的举荐。淳熙十五年杨万里为主张张浚配飨高宗与洪迈争论，上《驳配飨不当疏》，因措辞激烈，得罪孝宗，据周必大《思陵录下》（《文忠集》卷一七三）记载孝宗原话，则杨万里之疏主要是三点使孝宗不悦：一，“谓侍从数人附其议”；二，“言浚之功而不言其败”；三，“指鹿为马”一语。孝宗提出：“此两人皆除职与郡如何？”在这种情形下，周必大也只得表示同意。后来孝宗对杨万里仍憾之不已，周必大即说：“两去之足矣。”这就对杨万里实有回护之意了。由上所述看来，周必大在孝宗面前对杨万里从来都是力加援引和照顾的，怎么可能对好友做出那种排陷之事呢？事过不久，光宗嗣位，周必大罢相出判潭州，杨万里即写信安慰周必大，且附了诗，有“不妨冷眼看升沉”句（见《诚斋集》卷六六《与周子充少保书》），其中亦不包含一点薄憾在内，充满了同情，可见杨万里也不认为他是受了周必大的排挤。

(十一) “韩侂胄用事，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，尝筑南园，属万里为之记，许以掖垣。万里曰：‘官可弃，记不可作也。’侂胄恚，改命他人。卧家十五年，皆其柄国之日也。”

按：朱东润师《陆游传》指出：“《宋史》的记载是否可信，是值得怀疑的。当时万里罢官家居，实际上无官可弃，所谓‘官可弃’自不足信。”此说殊当。韩侂胄受赐南园为庆元三年二月（见《放翁逸稿》卷上《南园记》）。《杨传》所说“侂胄恚，改命他人”之“他人”，即指陆游。据于北山《陆游年谱》考证，陆游为韩侂胄作《南园记》在庆元六年至嘉泰二年闰十二月之间。如果韩侂胄曾属杨万里为他撰记，则亦当在庆元三年至嘉泰二年间，然而从庆元三年到嘉泰二年，从嘉泰二年到杨万里去世，杨万里一再加官晋爵（见于北山《杨万里交游考略》附表，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1年一期），多次请求致仕方获允许，嘉泰三年和开禧元年还一再征召他赴行在。如果他曾与韩侂胄发生正面冲突而使侂胄愤恚在胸，执政者会表现出这样厚意吗？《杨传》云：“卧家十五年，皆其（指韩）柄国之日也。”也不当。杨万里从绍熙三年归家，韩侂胄则从庆元元年方开始柄政，到杨万里去世（开禧二年）不过为十二年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